

## 第二章 南越国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南越国肇始于秦末汉初的动乱中，赵佗于西汉高祖三年（公元前 204 年）称王立国，至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平定岭南，存续 90 余年。南越国“分别与长沙、闽越、夜郎等国交界”，其疆域“向东与闽越相接，抵今福建西部的安定、平和、漳浦；向北主要以五岭为界，与长沙国相接；向西到达今之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句町等国相毗邻；其南则抵达越南北部，南濒南海”<sup>[1]</sup>，大致是今两广地区。

南越国存在于西汉前期。在中原地区汉墓的分期编年框架中，西汉前期起自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刘邦称帝，止于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铸行五铢，大约 80 年，包括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和武帝前段。《广州汉墓》将广州西汉前期墓葬的年代上限定为从秦派五军经略岭南的期间起（公元前 219 年），下限到汉武帝削平南越赵氏王国割据政权的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止，前后延续 108 年<sup>[2]</sup>，略超出中原地区西汉前期墓葬的时间范围。

根据历史背景和考古工作的实际情况，本书将岭南地区大致能够判断在秦汉之际至武帝前段的考古发现均视为南越国遗存，其中难免存在少许出入，但不至于影响整体认识。本章首先概述既往南越国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情况，结合晚近的研究成果对部分有争议的南越国墓葬加以甄别，其后简要讨论南越国墓葬的形制和棺槨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依托自然地理单元将南越国遗存划分为若干考古学文化区，这些内容有助于在宏观背景下考察合浦南越国遗存。

### 一、发现与研究概述

初步统计，已发表资料的南越国墓葬超过 600 座，其中发掘报告推断为西汉前期的墓葬约 400 座，通过分析比较能够判断为西汉前期的墓葬约 200 座；南越国时期及包含南越国时期遗存的遗址已经发现 10 余处<sup>[3]</sup>。此外，根据《交州外域记》<sup>[4]</sup>《广州记》<sup>[5]</sup>等文献记载，南越国势力范围已经进入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sup>[6]</sup>，越南东山文化<sup>[7]</sup>相当于西汉前期的墓葬，有些可能属于南越国遗存（参见附录《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年代学研究评述》），著名的古螺城遗址<sup>[8]</sup>也可能包含南越国时期遗存。

南越国墓葬以广州、乐昌、贺县（今贺州）、平乐、合浦等地分布最为集中，徐闻、封开、曲江、揭东、梧州、贵县（今贵港）、兴安、灵川、武鸣等地也有发现。南越国遗址以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和广州秦汉造船场遗址最为重要，其他主要是岭南各地发现的城址。今越南海防、东山和绍阳地区亦有南越国时期墓葬和城址发现。

## （一）南越国墓葬的发现

广东地区已发表资料的南越国墓约 320 座，其中《广州汉墓》收录相当于南越国时期的西汉前期墓葬 182 座<sup>[9]</sup>。1953—1960 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郊清理发掘汉墓 409 座，1981 年系统整理后的《广州汉墓》出版，其中西汉前期墓葬分布在华侨新村、西村石头岗、先烈路下二望岗、大北流花桥马驹岗、三元里马鹏岗、广州动物园麻鹰岗等 29 处地点，华侨新村<sup>[10]</sup>等地的材料先前已经发表。《广州汉墓》收录的西汉前期墓葬材料集中，成为岭南地区南越国墓葬研究的基础标尺，广州市郊南越国墓葬的分布还为探寻番禺城的范围提供了线索。

20 世纪 60—70 年代，广东地区南越国墓葬的清理发掘主要包括广州三元里马鹏岗 11 座<sup>[11]</sup>、淘金坑 22 座<sup>[12]</sup>，此外在广州东郊罗岗<sup>[13]</sup>、粤北地区曲江<sup>[14]</sup>等地也有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南越国墓葬的清理发掘主要有广州瑶台柳园岗 44 座<sup>[15]</sup>、乐昌对面山 53 座<sup>[16]</sup>、封开利羊墩 10 座<sup>[17]</sup>，此外在广州大宝岗<sup>[18]</sup>、黄花岗<sup>[19]</sup>、先烈南路<sup>[20]</sup>、园岗山<sup>[21]</sup>等地点和粤西地区徐闻<sup>[22]</sup>、粤东地区揭东<sup>[23]</sup>等地也有少量发现，近年来在广州增城浮扶岭发现一批战国晚期至南越国初期的墓葬材料<sup>[24]</sup>。

早在 1916 年广州东山龟岗曾经发现一座大型木椁墓，传为“南越文王胡冢”，已有学者指出讹误，判断其为南越国后段的南越权贵墓葬<sup>[25]</sup>。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广州发掘的南越国王侯贵族级别大墓主要有象岗南越王墓<sup>[26]</sup>、西村凤凰岗木椁墓<sup>[27]</sup>、东山猫儿岗农林上四横路木椁墓<sup>[28]</sup>、农林东路“人”字顶木椁墓<sup>[29]</sup>等，其中发掘报告和多数学者认为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赵昧是南越国第二位王赵胡<sup>[30]</sup>，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sup>[31]</sup>；发掘报告提及有学者推测西村凤凰岗木椁墓“便是当年被孙权掘掠的第三代南越王婴齐墓”。

广西地区已发表资料的南越国墓约 280 座。20 世纪 50 年代在贵县集中清理过几批汉墓，但均以简讯形式发表，报道不详细。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清理了贵县罗泊湾 M1、M2 两座王侯级别大墓<sup>[32]</sup>，在平乐银山岭发掘 110 座战国墓<sup>[33]</sup>和 13 座西汉前期墓<sup>[34]</sup>，在贺县河东高寨清理 5 座西汉前期木椁墓<sup>[35]</sup>。1980 年至今，广西地区南越国墓葬发现地点包括合浦<sup>[36]</sup>、钟山<sup>[37]</sup>、贵县<sup>[38]</sup>、灵川<sup>[39]</sup>、兴安<sup>[40]</sup>等地，其中武鸣安等秧墓地集中清理了 86 座小型土坑墓<sup>[41]</sup>，武鸣独山见有岩洞墓<sup>[42]</sup>，高等级墓葬包括贵县风流岭 M31<sup>[43]</sup>和贺县金钟 M1<sup>[44]</sup>。

多数学者认为，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和武鸣安等秧战国墓的实际年代为西汉前期，这两处地点是广西地区最为集中的南越国墓葬材料。贵县罗泊湾 M1、M2 为大型木椁墓，夫妻并穴合葬，已被盗掘，M2 出土遗物有晚于 M1 的迹象。发掘报告推测 M1 墓主为桂林郡守、郡尉<sup>[45]</sup>，有学者更明确地认为 M1 墓主是升任为郡守、郡尉的从中原南下的武将<sup>[46]</sup>，也有学者认为 M1 墓主为南越国册封的骆越王侯<sup>[47]</sup>、西瓯君<sup>[48]</sup>、苍梧秦王<sup>[49]</sup>。

## （二）南越国遗址的发现

广东地区南越国遗址主要包括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sup>[50]</sup>、秦汉造船场遗址<sup>[51]</sup>、磨刀坑遗址<sup>[52]</sup>、徐闻二桥遗址、澄海龟山遗址、五华狮雄山城址、英德连江口遗址、乐昌洲仔城址等地点，揭阳市揭东县汉代遗址<sup>[53]</sup>、揭西县赤岭埔遗址<sup>[54]</sup>也包含南越国时期遗存。此外信宜<sup>[55]</sup>等地有铜鼓等南越国时期零散遗物出土。

番禺城是后世广州城的基础，传说始建于楚庭，不过有学者认为关于楚庭的各种记述皆为穿凿附会，“岭南最早兴起的城市，当为秦汉时期的番禺”<sup>[56]</sup>。考古发现表明番禺城始建于南越国时期，宫城遗迹比较清楚，主体宫殿区和官苑区分别位于西、东两侧<sup>[57]</sup>。番禺城内发现有秦汉造船场遗址，外围可能有郭城，墓葬区主要分布在西郊、北郊和东郊的山岗上<sup>[58]</sup>。

五华狮雄山城址包括秦代和南越国时期遗存，根据出土“定揭之印”“定揭丞印”封泥文字，推测该城址原为秦和南越国“定揭道”治所<sup>[59]</sup>所在。徐闻二桥遗址出土包括“万岁”瓦当在内的大量南越国和汉代建筑材料<sup>[60]</sup>，学术界多认为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徐闻港口有关。澄海龟山遗址年代为西汉前期至东汉<sup>[61]</sup>，当与南越国和汉代南海郡揭阳县治有关<sup>[62]</sup>。乐昌洲仔城址年代为秦至西汉前期，有学者推测它为文献记载的“任嚣城”和“赵佗城”<sup>[63]</sup>。洲仔城址和英德连江口遗址<sup>[64]</sup>地处北江上游，性质为南越国时期的关隘城堡，扼守贯通南岭的骑田岭—北江通道。

广西发现的汉代城址包括全州梅潭屯城址、全州建安城址、灌阳湘溪村城址、兴安秦城城址（包括七里圩“王城”和通济村2座城址）、兴安城子山城址、贺州临贺故城（包括大鸭村、长利村和河西3座城址）、贺州高寨城址、武宣勒马城址、宾阳领方山城址、北流增劲塘城址、合浦大浪城址等，计11处14座<sup>[65]</sup>，其中贺州高寨城址、贺州长利村城址、兴安通济村城址和合浦大浪城址可能与南越国有关<sup>[66]</sup>，贵港贵城城址可能包括南越国时期遗存。

广西秦汉城址肇建于秦及西汉前期，目前较有把握确定在南越国时期的城址主要集中在桂东北地区，数量不多。湘桂走廊和潇贺古道连通湘江流域，桂东北地区受到楚文化冲击较早，秦汉时期城址、墓地分布密集。此外，梧州、藤县等地发现有南越国时期零散遗物<sup>[67]</sup>。

## （三）南越国遗存的研究

随着考古材料的累积，学术界对南越国遗存的研究日益深化，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也更加丰富，部分研究成果可参阅《南越国史研究论著、论文资料索引》<sup>[68]</sup>。本节就视野所及，择其要者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

## 1. 田野考古专刊、研究专著、论文集和综论

《广州汉墓》<sup>[69]</sup>《西汉南越王墓》<sup>[70]</sup>《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sup>[71]</sup>和《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sup>[72]</sup>等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发表材料系统集中，并且多就相关问题提出创见性认识，是最基础的研究资料。《南越国考古学研究》<sup>[73]</sup>是第一部以南越国考古研究为题目的个人论文汇集，专题研究深入，内容丰富。《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sup>[74]</sup>《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sup>[75]</sup>《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sup>[76]</sup>等论文集均集中收录一批相关研究成果，此外还有若干关于南越国史迹的研究综论<sup>[77]</sup>。这些田野考古专刊、专著、论文集和综论基本反映了目前对南越国遗存的整体认识深度和研究水平。

## 2. 南越国墓葬的甄别、分期编年、分区等考古学基础研究

南越国墓葬发现数量多、分布地域广，是南越国遗存的最大宗类型，最能够反映南越国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关于南越国墓葬的甄别，主要是对肇庆松山北岭、平乐银山岭、武鸣安等秧、灵山马川等地战国墓葬的年代有不同看法（详见本章第三节）。关于南越国墓葬的分期编年，主要是对《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第一段、第二段墓葬的绝对年代有修正意见（详见本章第三节）。关于南越国墓葬的分区研究目前认识尚不充分，但是已经显现出许多线索（详见本章第四节）。

## 3. 南越国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在南越国都城的研究中，番禺城的始建年代、城市形态、历史沿革及其与广州的关系，以及在岭南城市发展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历来受到关注<sup>[78]</sup>，现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番禺城的形制、布局、范围和宫苑遗址等方面。有些学者认为番禺城形制不规整，宫城位于全城北部，居民区主要在宫城以南、以西的位置<sup>[79]</sup>，北部越秀山等地可能还有礼制建筑或离宫<sup>[80]</sup>。有学者推测“番禺城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二者东西并列，而非内外相重”；东城沿用秦代旧城，分布居民间里和市场；西城新扩建，主体为宫城，外围可能有郭<sup>[81]</sup>。

在南越国宫苑遗址的研究中园林艺术和海外文化因素受到重视<sup>[82]</sup>，而在广州秦汉造船场遗址的性质上出现争议<sup>[83]</sup>。南越国地方城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华狮雄山、澄海龟山等地，涉及遗址时代、性质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等方面，其中徐闻二桥遗址与西汉合浦郡治、徐闻县治及汉代徐闻港口的关系<sup>[84]</sup>尤其受到关注，此外也有关于南越国苍梧王城线索的讨论<sup>[85]</sup>。根据新近发掘材料，贵港贵城遗址初步可以判断为秦至南越国时期的桂林郡治和汉代郁林郡治。

## 4. 南越国遗存文化特征及文化因素构成的考古学研究

象岗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显示出中原汉文化、本土越文化、岭北楚文化和海外文

化等多元交融的复合性状，在南越国遗存中具有代表性，对该墓葬考古学文化因素构成情况的分析<sup>[86]</sup>颇受重视。其他包括对南越国丧葬习俗及其文化特征的探讨<sup>[87]</sup>、南越国与闽越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sup>[88]</sup>等。

## 5. 南越国王侯贵族墓葬研究

南越国王侯贵族墓葬研究主要集中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和贵县罗泊湾 M1、M2。关于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赵昧与南越国第二位王赵胡的关系是讨论焦点，其他包括葬制及敛具、人殉及玺印等随葬器物、壁画等方面的研究<sup>[89]</sup>，以及南越王墓与长沙王墓、南昌海昏侯墓的比较研究<sup>[90]</sup>。关于贵县罗泊湾 M1、M2，首先是对于墓主身份和族属存在不同看法，其他包括葬具和人殉、漆画、度量衡、木牍和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sup>[91]</sup>。此外，有学者考证广州龟岗木椁墓的墓主可能为南越国后期“王国的三公列卿或者郡守、郡尉守之属”<sup>[92]</sup>，推测贺县金钟 M1 墓主可能为苍梧秦王配偶<sup>[93]</sup>，还有学者对“任器墓”墓主加以考辨<sup>[94]</sup>。

## 6. 南越国出土文物研究

有关南越国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很多，有些内容与前述南越国王侯贵族墓葬的专题研究交叉，有些研究结合南越国的手工业生产展开<sup>[95]</sup>。铁器<sup>[96]</sup>、青铜器<sup>[97]</sup>研究还涉及南越国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并且关联南越国遗存的分期编年框架，因此受到重视。玉器<sup>[98]</sup>和建筑材料<sup>[99]</sup>研究也颇受关注，其他研究包括陶器、铜镜、钱币、乐器、医具、符节等方面<sup>[100]</sup>。

## 7. 南越国玺印研究和出土文字考释

玺印和出土文字资料<sup>[101]</sup>可以与文献史料相参照，能够直观反映南越国的典章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特别受到重视。研究对象包括象岗南越王墓玺印<sup>[102]</sup>、其他南越国印章<sup>[103]</sup>、南越国宫苑遗址出土的木简<sup>[104]</sup>、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木牍<sup>[105]</sup>和陶器铭文<sup>[106]</sup>等。

## 8. 以南越国遗存为基础的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和民族史研究

南越国建立在百越之地，秦汉时期不断南下的楚人、秦人、汉人与岭南土著越人持续融合，决定了南越国主体居民的次生越人文化属性<sup>[107]</sup>，南越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南越国居民融入中华一体进程的历史<sup>[108]</sup>。相关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和民族史研究集中在西瓯遗存<sup>[109]</sup>和骆越遗存<sup>[110]</sup>的分析、西瓯与骆越遗存的辨别与比较<sup>[111]</sup>、苍梧遗存的探寻<sup>[112]</sup>、江浙越人的迁移<sup>[113]</sup>、族群分布格局的考察<sup>[114]</sup>，以及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的融合<sup>[115]</sup>等方面。

## 9. 结合南越国遗存开展的南越国史研究

以《古南越国史》<sup>[116]</sup>和《南越国史》<sup>[117]</sup>两部著作作为代表。出版年代较晚近的《南越国史》(修订本)补充了近年来新出土的南越国资料,其中农业经济、冶铸业、制陶业、纺织业、漆木器及玻璃玉石制造业、商业和交通、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章节利用了考古材料,从而“较系统地反映南越国时期岭南大地的历史全貌”<sup>[118]</sup>。有学者依据墓葬材料对南越国政权建制、社会结构、经济文化及其在岭南地区开发的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阐述<sup>[119]</sup>,其他结合考古材料进行的南越国史研究亦包括上述领域<sup>[120]</sup>,并涉及科学技术、医疗观念、生态环境等方面<sup>[121]</sup>,其中海外交通史尤其受到关注<sup>[122]</sup>。

## 10. 南越国遗存的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展示利用和文化遗产价值研究

近年来,南越国遗存相关的科技考古、文物保护<sup>[123]</sup>、展示利用和文化遗产价值研究<sup>[124]</sup>逐渐发展为新兴领域,南越国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sup>[125]</sup>亦提上日程。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南越国宫苑遗址及包含南越国时期遗存的徐闻二桥遗址等南越国史迹极大地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内容和价值体系<sup>[126]</sup>。

南越国遗存研究是战国秦汉岭南地区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内容相互渗透、相互结合(参见第七章第三节);并且南越国遗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考古学文化发展方向,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岭南地区西汉中期以后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参见附录《南越国遗存与岭南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前面的总结难免挂一漏万,但是可以看到南越国遗存的研究已经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具备了比较坚实的深入研究基础。不过就宏观而言,南越国遗存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仍然显得薄弱,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南越国遗存分期编年框架的完善和南越国考古学文化的分区研究。

## 二、南越国墓葬的甄别

岭南地区秦汉遗存的年代学框架建立在《广州汉墓》的分期基础上。按照《广州汉墓》的分期,广州西汉前期墓葬的年代上限从秦派五军经略岭南的期间起(公元前219年),下限到汉武帝削平南越赵氏王国割据政权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止,前后延续108年,期间划分为南越国前期、后期两段<sup>[127]</sup>。

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广州西汉前期墓葬的年代应该后移,而早前已有学者提出平乐银山岭战国墓<sup>[128]</sup>、肇庆北岭松山墓<sup>[129]</sup>、德庆落雁山墓<sup>[130]</sup>、四会高地园墓<sup>[131]</sup>、广宁铜鼓岗墓<sup>[132]</sup>等一批被认为是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实际年代为西汉前期,不过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对于岭南地区战国秦汉遗存年代学框架的不同认识,集中在米字纹陶类型的年代、出土铁器遗存的年代和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第一段”的实际年代这三个内涵关联、内容有所交集的议题,核心问题在于米字纹陶类型的年代下限。有必要对这

些意见进行检讨，进而对年代存疑的南越国墓葬加以甄别。

### （一）关于米字纹陶类型年代下限的不同意见

东周时期岭南地区主要存在夔纹陶和米字纹陶两种遗存类型，曾经被认为是并行关系。其后在博罗银岗遗址<sup>[133]</sup>的地层关系中，发现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银岗二期遗存叠压在以夔纹陶为代表的银岗一期遗存之上，据此确认夔纹陶类型早于米字纹陶类型，两者间是一种继承或替代关系。既往一般认为米字纹陶类型年代为战国，其下限可能延续至西汉<sup>[134]</sup>。

晚近有学者提出米字纹陶出现在战国晚期，米字纹陶类型的主体年代处于西汉纪年范围<sup>[135]</sup>，其流行时间主要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文帝时期，文帝晚期至武帝初期属于米字纹陶向几何纹戳印硬陶的过渡阶段，武帝元朔年间以后为几何纹戳印硬陶的鼎盛阶段<sup>[136]</sup>。并根据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和秦汉造船遗址的出土材料，指出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第一段”的大多数墓葬的年代并不能早至《广州汉墓》推断的“秦始皇二十八年至文景时期”，其实际年代与南越王墓大致相当或稍早，而填补“西汉前期第一段”空白的考古遗存，就是既往认为流行于战国时期的米字纹陶类型的主体遗存<sup>[137]</sup>。

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在两广地区发掘大量汉代墓葬，文化面貌已十分清楚，基本上没有见到米字纹硬陶器”<sup>[138]</sup>；推断始兴白石坪第二次<sup>[139]</sup>和第三次发掘<sup>[140]</sup>、增城西瓜岭<sup>[141]</sup>、高要茅岗<sup>[142]</sup>、深圳叠石山<sup>[143]</sup>等米字纹陶比较流行的遗址的年代大部分仍未到秦汉时期，肇庆北岭松山、平乐银山岭、武鸣安等秧、广宁铜鼓岗、四会高地园等“出土米字纹陶的墓葬中，部分墓葬年代仍为战国时期，亦有部分墓葬年代已达秦汉时期。但在上述这些年代已达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可以发现米字纹陶在所出土的陶器中只占有较少比例，只是零星发现，已经不再流行”<sup>[144]</sup>。

### （二）关于岭南地区秦汉遗存年代框架修正的主要观点

近些年来以米字纹陶类型的年代下限为中心，对岭南地区东周秦汉遗存年代框架的调整、修正和完善意见引起了广泛注意，相关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很大一部分米字纹陶遗存属于秦至西汉前期。一些学者认为，始兴白石坪、增城西瓜岭、博罗银岗二期、封开利羊墩、广宁铜鼓岗、广宁龙嘴岗<sup>[145]</sup>等遗址和墓地出土陶器的米字纹已经消退；“与这一陶器群共出的还有板瓦、筒瓦、云纹瓦当、青铜带钩、玉带钩、陶马泥塑模型、青铜盖弓帽等车马器及铁锛、锄、斧、铤、凿、削、刮刀、矛等铁质生产工具和兵器”，这些体现建筑结构风格、服饰文化、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外来文化因素应该视为秦统一岭南的界标性实物，据此可以将这批遗存的年代推定在秦至南越国时期<sup>[146]</sup>。

第二，第二，由于米字纹陶遗存的主体年代已经进入秦汉纪年，原来被推断在战

国时期的出土铁器的米字纹陶遗存年代相应下延到秦至西汉前期，如始兴白石坪、深圳叠石山、博罗银岗二期等遗址和封开利羊墩、平乐银山岭、灵川马山、灌阳古城岗等墓地，因此“两广现在发现的秦至西汉前期的铁器基本属岭北输入品”<sup>[147]</sup>，也就是说岭南地区出土铁器的遗存年代不能早于秦定岭南之前。有学者则认为虽然“出土了铁器的米字纹陶遗址和墓葬大多已经到达秦汉时期”，但逆推关系未必成立，“铁器的有无并不能作为判断遗存年代的唯一依据”<sup>[148]</sup>。

第三，有学者认为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第一段的文化面貌整体较接近，而与两汉前期第二段差异较大，以南越王墓为基点，西汉前期第一段只能处在汉武帝前期，第二段应晚于汉武帝元朔末年至元狩初年，即处在南越国末期甚至更晚，而米字纹陶类型则填补了“西汉前期早段”遗存的空白<sup>[149]</sup>。有学者则认为前述认识中作为比较对象的标型器并非典型器物，南越王墓出土陶器的年代“仍应该与广州汉代早期墓第二段时间相当，即《广州汉墓》报告对广州西汉早期墓的分段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sup>[150]</sup>。

### （三）对于岭南地区秦汉遗存年代框架的检讨

前述讨论的争议焦点首先在于米字纹陶的年代下限，因为其决定着究竟是“只有西汉遗存出铁器”还是“大多数铁器出自西汉遗存”两个完全不同的推论前提，关乎“出土铁器遗存”与“西汉时期”的等同关系和逆推关系能否成立，同时也决定着是否存在能够填补“西汉前期早段”空白的遗存。而米字纹陶的年代下限是否进入西汉时期的讨论存在着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隐患，因为无论何种判断都不能完全摆脱既有年代框架的参照体系。此外，有学者提出石峡遗址中文化层及肇庆茅岗遗址陶器上的米字纹“是在印制复线方格纹过程中由于重合而形成的一种局部现象”，与通常所说的米字纹陶不同<sup>[151]</sup>，对米字纹陶的界定可能也需要考虑。

至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第一段实际年代的分歧，除典型器物的选取标准不同外，南越王墓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的对比分析仍然是以《广州汉墓》的分期为基础，而进行讨论的初衷是其分期的可靠性问题。比如，若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存在较多“两段共有的器物”，则第一段部分墓葬是否本应该归入第二段就值得考虑。因为目前的讨论仍然停留在既有的年代学认识的逻辑框架中，所以南越王墓出土的陶器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的比较分析也潜含有循环论证的陷阱。

米字纹陶的年代下限和米字纹陶主体年代的下限在年代学上的意义不同，文化意义也不同，零散输入铁器和岭南本土生产铁器亦如此。上述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要依赖于更多新材料提供的证据，不过这些讨论极大地深化了对岭南地区秦汉遗存年代框架的认识，并且形成了一些相对共识，目前基本能够确定始兴白石坪（第二、第三次

发掘)等遗址和肇庆北岭松山、平乐银山岭等墓地已经进入秦汉纪年。依此认识,则秦汉文化进入岭南地区并未立即切断百越文化的根脉,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百越考古学文化与中原考古学文化尚且存在一段平行发展时期。

北方边远地区由于长城烽燧线的存在,长城内外的考古遗存有着明确的空间分野,可以各自纳入不同文化系统的编年体系,不至于混淆。而岭南地区秦至西汉前期中原和百越两套文化系统交织在一起,很容易形成年代前后相继的错觉,这类情形亦见于朝鲜西北部、云贵高原等边远地区,因此对于岭南地区秦汉遗存编年序列的检讨也具有方法论意义。不过,虽然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存在年代后移的可能性,但是未必是全部墓葬年代后移,一些墓葬仍然处于原来的分期位置上。

#### (四) 对于岭南地区若干南越国墓葬的甄别

除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外,岭南地区还有一些南越国墓葬存在年代争议,主要是有些原来推定在战国时期的墓葬有可能晚至南越国时期,也有少数原来推定在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可能会晚至西汉中期。此外,有些墓葬所在地点是否属于南越国辖境可能也需要考虑。

平乐银山岭发掘 110 座战国墓,发掘报告已经指出不排除部分墓葬有进入秦或西汉初期的可能<sup>[152]</sup>。《广州汉墓》最早注意到这批墓葬“似应定为西汉早期”<sup>[153]</sup>,其后有学者认为这批墓葬“属于南越王国早期”<sup>[154]</sup>,或进一步推断在西汉文景时期<sup>[155]</sup>。平乐银山岭墓地是广西地区战国秦汉时期遗存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尺,学术界目前倾向于这批“战国墓”的主体年代为西汉前期<sup>[156]</sup>(参见附录《平乐银山岭墓地的年代学问题》)。四会高地园<sup>[157]</sup>、广宁铜鼓岗墓<sup>[158]</sup>等战国墓与平乐银山岭情况类似,有学者认为其年代相当于南越国早期<sup>[159]</sup>。

肇庆北岭松山木椁墓规模较大,出土器物丰富。随葬瓮、罐、甗、盒、钵等陶器,编钟、鼎、罍、提梁壶、附耳筒、三足盘、锅、剑、矛、斧、铍、镞形器、铲形器、刻刀、削刀、镜等铜器,以及金柄玉环、玉带钩、琉璃珠、砺石等<sup>[160]</sup>。发掘报告推断为战国墓,有学者指出其年代当为西汉前期<sup>[161]</sup>、秦末汉初<sup>[162]</sup>或秦汉之际的南越国时期<sup>[163]</sup>。该墓受到汉式墓葬制度和楚文化的影响,墓底铺鹅卵石和铜柱形器、铜镇等器物,具有越文化特征,墓主当为南越国时期的越人王侯贵族。

封开利羊墩墓地发掘战国至西汉早期墓葬 41 座,其中西汉早期墓葬 10 座, M24 等也可能属于西汉早期<sup>[164]</sup>。多为长方形窄坑墓,仅 M19 为设置斜坡墓道的“凸”字形土坑墓,少数墓底有腰坑,见有木质棺椁痕迹,出土陶器有瓮、罐、甗、三足盒、碗(钵)等。该墓地材料发表比较简略,分期基本可从。有学者认为封开利羊墩墓地原定为战国晚期的 M12(出土铁锛),乐昌对面山墓地原定为战国时期的 M184(出土铁锛)和 M4

(出土铁斧)<sup>[165]</sup>，灌阳古城岗墓地原定为战同时期的 M1 (出土铁斧、铁削)<sup>[166]</sup>，均应当为秦至西汉前期墓葬<sup>[167]</sup>。灵川马山墓地清理墓葬 7 座，发掘简报认为这批墓葬与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相似性较大，尤其是未见仿铜陶礼器陶组合，推断其年代主要属于战国时期，M6 的年代可能晚至西汉<sup>[168]</sup>。岑溪花果山墓地两次清理墓葬 14 座，发掘简报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形制及组合、米字纹陶等方面与平乐银山岭等地战国墓的相似性，推断这些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晚期<sup>[169]</sup>。有学者根据这两处墓地出土的斧、锛、刀、剑等铁器，认为其属于秦至西汉前期<sup>[170]</sup>；有学者认为灵川马山墓地的年代宜随着平乐银山岭战国墓断代的调整而改定为西汉早期<sup>[171]</sup>。

武鸣马头安等秧山 86 座土坑墓<sup>[172]</sup>及独山岩洞葬<sup>[173]</sup>的发掘、调查简报断代为战国时期。根据安等秧墓地出土陶器的器型、陶质和纹饰均与两广发现的其他西汉早中期墓所出陶器相同或近似，一字格铜剑、铜带钩、铜钟、铜镯、铁锛等均属西汉以来才可能在此地出现的器物，而独山岩洞葬部分器物与安等秧墓地的类同，有学者认为这两处墓地属于西汉早中期<sup>[174]</sup>；不过有学者认为安等秧墓地“原定战国时期没有不当”<sup>[175]</sup>。安等秧墓地的主体年代可以考虑处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sup>[176]</sup>。

一些原来认为属于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年代也有可能偏晚，或者对其所属的南越国时段有不同意见。如发掘报告推测贵县罗泊湾 M1 的年代下限不晚于文景时期，M2 的年代下限为汉文帝前元元年至十六年（公元前 179 年至公元前 164 年）<sup>[177]</sup>，有学者认为“罗泊湾汉墓的断代略有偏早之虞”，参照广州汉墓，大型分室木椁墓、高大封土堆、斜坡墓道等形制和出土的四叶螭纹铜镜均为南越国后段特征，因此推断其“年代上限不应早于汉景帝中元年间”<sup>[178]</sup>。有学者认为罗泊湾 M2 出土的部分陶器如 II 式盘口壶表现出较晚特征，可能晚至西汉中期<sup>[179]</sup>。

又如发掘报告认为贺县金钟 M1 属于南越国侯王及其配偶，年代为西汉前期后段<sup>[180]</sup>。有学者根据出土草叶纹镜，断定金钟 M1 是目前已知南越墓中年代最晚的，即距南越国灭亡最近的墓葬之一<sup>[181]</sup>。有学者认为“方格纹地加戳印这类几何印纹硬陶”在广西沿用时间很长，“井、仓、灶、屋等模型明器以及提筒、四耳罐等遗物”在广西西汉中期墓葬并非普遍，尤其是广州汉墓西汉后期墓葬才较普遍出现夫妻同穴合葬，因此该墓年代当在西汉中期后段甚至稍晚，并根据墓葬形制判断贵县风流岭 M31<sup>[182]</sup>年代不会与贺县金钟 M1 相差太远<sup>[183]</sup>。

此外，还有发掘报告断代较宽泛的情况。如曲江马坝摇松岭 M1 的发掘简报将该墓的年代断定为西汉<sup>[184]</sup>，该墓出土 II 式陶罐、铁削等器物与广州汉墓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器物一致；广州东郊罗岗 M4 的发掘简报根据出土的“十四年属邦”铜戈将该墓的年代定为秦末<sup>[185]</sup>，该墓形制和随葬器物均与西汉初年的罗岗 M3 相同。有研究认为摇松岭 M1 属于西汉前期，罗岗 M4 的年代应当为西汉初年<sup>[186]</sup>。

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遗存年代框架的完善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过程，意见不可能遽然统一。本书酌情采纳上述研究成果，将相对具有共识的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灵川马山、武鸣安等秧等墓地作为南越国墓葬论述，其他墓葬一般遵照原报告的年代判断。由于南越国疆域或势力范围存在一定模糊性，本书将岭南各地秦至西汉前期的考古发现一并纳入南越国遗存范畴。

- 
- [1]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77、95页。参见徐俊鸣：《从马王堆出土的地图中试论“南越国”的北界》，《岭南文史》1987年第2期；冼剑民：《南越国边界考》，《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 [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第456页。
- [3] 卓猛：《南越国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分区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 [4] 《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记赵佗击破安阳王后，“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
- [5] 《史记索隐》引裴渊《广州记》记“后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瓯骆也”。
- [6] 郑君雷：《南越国“西于王”事迹钩沉》，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76-283页。
- [7] [越南]黎文兰、范文耿、阮灵：《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梁志明译，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2。
- [8] 古螺城（Co Loa，又名越王城、可缕城）遗址位于越南永福省东英县，有三重夯土城垣，外垣周长约为8000米。古螺城相传是蜀泮修筑的瓯雒国都城，赵佗击破安阳王后在此分封了西于王，西汉交趾郡时期为西于县治，东汉马援分拆西于县后为封溪县治。
- [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
- [10] 麦英豪：《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墓》，《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 [1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三元里马鹏岗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62年第10期。
- [12]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 [1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罗岗秦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 [14]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马坝的一座西汉墓》，《考古》1964年第6期。
- [15] 黄森章：《广州瑶台柳园岗西汉墓群发掘记要》，载广州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穗港汉墓出土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3，第248-256页。
- [16]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 [17] 杨式挺、崔勇、邓增魁：《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 [18]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先烈南路大宝岗汉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

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235-261页。

[19]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20]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先烈南路汉晋南朝墓葬》，载《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49-72页。

[21]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萝岗区园岗山越人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2》，文物出版社，2008，第254-262页。

[2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23] 魏峻：《揭东县面头岭墓地发掘报告》，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第51-102页。

[24] 广东省文物局：《广东文化遗产·古墓葬卷》，科学出版社，2013，第154页。

[25] 全洪：《重识龟岗汉冢——广州东山龟岗南越木椁墓年代及墓主问题》，载澳门博物馆编《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论文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5，第84-95页。

[26]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27]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西村凤凰岗西汉墓发掘简报》，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197-206页。

[28]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东山发现西汉南越国大型木椁墓出土大批珍贵漆木器》，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第308-310页。

[29]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35-48页。

[3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第319-325页；麦英豪、黎金：《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刘瑞、冯雷：《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吴凌云：《南越王墓墓主问题》，广州文化局、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论丛（第2辑）》，广州出版社，2005，第87-89页；叶永新：《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赵胡说补证》，《文博》2008年第3期。

[31] 吴海贵：《象岗南越王墓主新考》，《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3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

[3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3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3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29-45页。

[36]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台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

[37]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钟山县文物管理所：《钟山铜盆汉墓》，科学出版社，2018。

[3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北郊汉墓》，《考古》1985年第3期。

[3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市文物工作队、灵川县文物管理所：《灵川马山古墓群清理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28-237页。

[4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兴安石马坪汉墓》，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38-258页。

[4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42]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4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4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贺县文物管理所：《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考古》1986年第3

期。

-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9-91页。
- [46] 蒋廷瑜:《贵县罗泊湾汉墓墓主族属的再分析》,《学术论坛》1987年第1期。
- [47] 蓝日勇:《试论罗泊湾一号墓墓主身份及族属》,《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 [48] 黄展岳:《关于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问题》,载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第193-202页。
- [49] 陈小波:《布山县治贵港说质疑》,载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153-164页。
-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00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2008。
- [51]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李灶新:《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第三次发掘》,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广州出版社,2001,第85-110页。
- [5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磨刀坑汉代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第5期。
- [53] 魏峻:《揭东县先秦两汉遗址调查报告》,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第129-180页。
- [54] 魏峻:《揭西县赤岭埔遗址调查报告》,载揭阳考古队、揭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揭阳考古2003-2005》,科学出版社,2005,第190-200页。
- [55] 林健超:《信宜丁堡出土汉代铜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第128页。
- [56] 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它》,载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文物出版社,1988,第79-92页。
- [57] 胡建:《从考古发现谈南越国都城的特点》,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75-90页。
- [58] 麦英豪、黎金:《考古发现与广州古代史》,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出版社,2003,第3-34页。
- [59]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华狮雄山》,科学出版社,2014,第182-183页。
- [6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广东徐闻县五里镇汉代遗址》,《文物》2000年第9期。
- [6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澄海市博物馆、汕头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 [62] 邱立诚:《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 [63] 邱立诚:《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 [64] 梁明燊:《广东连江口发现汉代遗址》,《考古》1964年第8期。
- [65] 李珍、覃玉东:《广西汉代城址初探》,载广西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第43-50页;熊昭明:《广西的汉代城址与初步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汉长安城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第225-232页。
- [66] 熊昭明:《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5-41页。
- [6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近年来发现的四件铜鼓》,《考古》1980年第4期;梧州市博物馆:《广西梧州市近年来出土的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77年第2期;黄汉超:《广西藤县出土一批汉代文物》,《文物》1981年第3期。

- [68] 王川、唐浩中、吴凌云等：《南越国史研究论著、论文资料索引》，载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423-496页。
- [69]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
- [7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 [7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
- [72] 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
- [73] 黄展岳：《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74] 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
-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
- [76] 南越王宫博物馆：《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译林出版社，2015。
- [77] 程存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7期；邱立诚：《有关南越国史迹的几项考古发现》，载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8，第80-91页；冯永驱：《考古发现的南越国史迹与广州早期历史》，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1-34页；熊昭明：《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5-41页。
- [78] 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它》，载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文物出版社，1988，第79-92页；曾昭璇、曾宪珊：《南越国都番禺城的城市结构》，载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303-323页；李龙章：《番禺城始建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广州文博（集刊1993~1995）》；黄淼章：《南越国番禺都城对广州早期城市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四辑）》，三秦出版社，2000，第213-221页；李翰：《广州建城年代新考——兼与麦英豪先生商榷》，《华中建筑》2006年第12期；陈泽泓：《南越国番禺城析论》，载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8，第106-123页。
- [79] 胡建：《从考古发现谈南越国都城的建筑特点》，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75-90页。
- [80] 徐龙国：《南越国时期番禺城相关问题的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63-74页。
- [81] 杨勇：《西汉南越国时期番禺城的基本物质形态》，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129-137页。
- [82] 刘庆柱：《评〈南越宫苑遗址——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考古》2009年第12期；郑力鹏、郭祥：《秦汉南越国御苑遗址的初步研究》，《中国园林》2002年第1期；李灶新：《广州西汉南越国宫苑园林艺术》，载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论丛（第2辑）》，广州出版社，2005，第77-82页；全洪、李灶新：《南越宫苑遗址八角形石柱的海外文化因素考察》，《文物》2019年第10期。
- [83] 麦英豪、冯永驱：《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出版社，2003；杨鸿勋：《南越王宫殿辩——与“船台说”商榷》，载《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增订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第282-292页；冯永驱、陈伟汉、全洪：《广州秦代造船遗址考辨——兼评杨鸿勋〈南越王宫殿辩〉》，《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26日。
- [84] 全洪：《关于汉代徐闻港的若干问题》，《岭南考古研究（第二辑）》，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崔勇：《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与汉代徐闻港的关系》，《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
- [85] 蒋廷瑜：《试从考古发现探寻汉晋广信县治的地理位置》，载《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266-272页；郑伟标：《“苍梧王城”的建立论及城址考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

集（第十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第79-85页。

[86] 麦英豪：《西汉南越王墓随葬遗物的诸文化因素》，载香港博物馆编《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第124-139页；邱丹丹：《广东西汉南越王墓内含的文化因素分析》，载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第208-215页；夏增民：《由广州南越王墓所见文化遗存透视岭南文化变迁》，《华夏考古》2010年第1期；张荣芳、周永卫、吴凌云：《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87] 黄森章：《南越国的丧葬习俗》，《岭南文史》2000年第3期；蓝日勇：《广西战国至汉初越人墓葬的发展与演变》，《广西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商志疆、黎晓云：《从岭南地区出土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物看岭南越文化的特点》，载香港博物馆编《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第108-117页；李明斌：《浅析广州西汉前期墓葬中的楚文化因素》，载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第256-263页。

[88] 杨琮：《论西汉东、南两越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梅华全：《闽越与南越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吴海贵：《南越与东越的诸侯王陵墓》，《华夏考古》2006年第4期；杨勇：《闽越国与南越国建筑用陶的比较研究——以几何印纹铺地砖和瓦当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233-246页；刘春华、王志友：《西汉南越王墓前室壁画意义试析》，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等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125-130页。

[89] 麦英豪、吕烈丹：《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葬制、人殉诸问题刍议》，《开放时代》1984年第4期；黄新美：《南越文王墓葬的人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王学理：《南越王墓“外藏椁”设置之我见》，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等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77-85页；王文建：《西汉南越王的丝缕玉衣再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96-104页；黄展岳：《南越王墓的丝缕玉衣和组玉佩》，载《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125-138页。

[90] 高崇文：《西汉长沙王墓和南越王墓葬制初探》，《考古》1988年第4期；黄允聪、吴小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与广州南越王墓的异同比较》，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咸阳师范学院编《秦汉研究（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18，第21-29页。

[91] 张勋燎：《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的“春塘”葬具和人殉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郑超雄：《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漆画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文化异同论》，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建馆60周年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第111-117页；蒋廷瑜：《罗泊湾铜器漆画解读》，《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蒋廷瑜：《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度量衡资料分析》，载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延边科学技术大学编《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147-151页；彭书琳、张文光、魏博源：《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殉葬人骨》，《考古》1986年第6期。

[92] 全洪：《重识龟岗汉冢——广州东山龟岗南越木椁墓年代及墓主问题》，载澳门博物馆编《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论文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5，第84-95页。

[93] 郑君雷：《汉印与岭南汉代史迹》，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32-243页。

[94] 张强禄：《南海郡尉任嚣墓考辨》，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编《西部考古（第十七辑）》，科学出版社，2019，第143-154页。

[95] 蒋廷瑜：《先秦两汉时期岭南的青铜冶铸业》，载《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248-255页；蒋廷瑜：《略论南越国的青铜冶铸业》，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91-95页。

[96] 黄展岳：《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考古》1996年第3期；李龙章：《西汉南越王墓“越式大铁鼎”考辨》，《考古》2000年第1期。

[97] 李龙章：《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器研究》，《考古学报》1995年第3期；李龙章：《广州西汉南越

王墓出土青铜容器研究》，《考古》1996年第10期；蒋廷瑜：《西汉南越国时期的铜桶》，《东南文化》2002年第12期；高占盈：《南越王墓船纹铜提筒纹饰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曲用心：《略论岭南地区西汉早期青铜器的特征及成因》，《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黄展岳：《论南越国出土青铜器》，载《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91-108页。

[98] 闻广：《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西汉南越王墓玉器》，《考古》1991年第11期；卢兆荫：《南越王墓玉器与满城汉墓玉器比较研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黄展岳：《论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璧》，载《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第355-362页；陈群、刘朝辉：《南越王墓玉器分布状况及其内涵研究》，《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

[99] 李灶新：《南越国官署遗址2000年发掘出土瓦当研究》，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1》，文物出版社，2004，第122-137页；胡建：《南越国陶质建筑材料的地域特征》，《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10日；杨勇：《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铺砖初步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08；章昉：《南越国官署遗址出土的砖瓦及其生产初探》，《文博》2019年第3期。

[100] 全洪：《南越国铜镜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萧亢达、陈伟汉：《试谈西汉南越国的商品经济与官署遗址出土的鍍金半两铜钱》，载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第193-199页；黄维：《西汉南越王墓银板——兼谈文献中的“银锡”》，《中国钱币》2017年第5期；李灶新：《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出土的钱币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钱币》2019年第6期；蒋廷瑜：《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乐器》，《中国音乐》1985年第3期；林冠男：《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陶响器试析》，《东南文化》2018年第2期；蓝日勇：《广西贵县汉墓出土银针的研究》，《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何琳仪：《南越王墓虎节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101] 陈直：《广州汉墓群西汉前期陶器文字汇考》，《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李光军：《两广出土西汉器物铭文官名考》，《文博》1987年第3期；广州市文化局：《考古发现的南越玺印与陶文》，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05；谢崇安：《西汉南越国墓出土铭刻补释三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黄展岳：《南越王墓出土文字资料汇考》，载《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205-233页。

[102] 黄展岳：《南越“文帝”金印小考》，《广东文博》1984年第1期；黄鸿光：《广州象岗大墓“赵昧”印释》，《学术研究》1984年第5期；余天炽：《广州南越王墓印文释》，《学术论坛》1985年第9期。

[103] 黄展岳：《“朱庐执到”印和“劳邑执到”印——兼论南越国自铸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日本]吉开将人：《南越印章二题》，载王人聪、游学华编《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蒋廷瑜：《“劳邑执到”琥珀印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白芳：《西汉南越国“夫人”玺印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10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官博物馆筹建处：《南越国官署遗址出土木简》，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物出版社，2005，第31-34页；曹旅宁：《南越国官署遗址所出法律简牍初探》，载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二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8，第134-140页；汤志彪、周群：《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所出西汉木简释读二题》，《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何有祖：《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出土西汉木简考释》，《考古》2010年第1期；黄展岳：《南越木简选释》，载《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234-244页。

[105] 陆锡兴：《关于罗泊湾汉墓〈从器志〉的重文号》，《文物》1984年第4期；蓝日勇：《〈东阳田器志〉木牍考释》，《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蓝日勇：《〈东阳田器志〉木牍发微》，《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王贵元：《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木牍字词考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06] 吴凌云：《“秦后”印戳和“苍梧”印戳——两件反映南越国内部关系的新物证》，《广东史志》1999年第3期；蓝日勇：《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出土陶盆上戳印文的释读问题》，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0，第366-371页；辛蔚：《南越国“圭禾司”印与“夫禾司”印考》，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二十二辑）》，

科学出版社, 2017, 第 207-218 页; 辛蔚:《南越国“圭禾司”印与“夫禾司”印续考》,《暨南史学》2019 年第 1 期。

[107]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2008 年第 3 期。

[108] 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109] 蒋廷瑜:《从银山岭战国墓看西瓯》,《考古》1980 年第 2 期; 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 217-230 页; 洪德善:《平乐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与族属探讨》,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五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 78-87 页。

[110] 覃彩銮:《骆越青铜文化初探》,《广西民族研究》1986 年第 2 期; 张一民、何英德:《从出土文物探骆越源流及其分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S1 期; 马头发掘组:《武鸣马头墓葬与古代骆越》,《文物》1988 年第 12 期; 蒋廷瑜:《右江流域青铜文化族属试探》,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 502-518 页。

[111] 蒋炳钊:《关于西瓯、骆越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广西民族研究》1987 年第 4 期; 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载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等编《百越研究(第一辑)——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第 86-104 页; 陈文:《也说西瓯与骆越》,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 108-112 页。

[112] 徐恒彬:《论岭南出土的“王”字形符号青铜器——兼谈苍梧及西瓯国地望问题》,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 郑君雷:《西瓯、苍梧与南越》,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 263-272 页。

[113] 富霞、熊昭明:《从广西发现的土墩墓看越南南迁》,《考古》2016 年第 8 期。

[114] 李秀国:《西江地区东周墓族属辨析》,载封开县博物馆编《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 郑君雷:《北江上游的南越国墓及秦汉岭南的族群分布》,《四川文物》2006 年第 3 期。

[115] 张荣芳:《从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看秦汉时期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载《华学》编辑委员会编《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第 135-141 页; 刘晓民:《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东南文化》1999 年第 1 期; 张启珍:《南越国内的汉越文化融合例证》,载吴春明、蓝达居、何斌主编《百越研究(第四辑)——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第 46-56 页。

[116] 余天炽、覃圣敏、蓝日勇等:《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117]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18] 麦英豪:《序言》,载张荣芳、黄森章著《南越国史》(修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19] 黄展岳、麦英豪:《从南越墓看南越国》,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 449-465 页; 吕烈丹:《南越王墓与南越王国》,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 蓝日勇、蒋廷瑜:《广西汉墓的发掘与南越国史研究》,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 238-248 页。

[120] 李安民:《汉初“南越国”社会性质试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3 期; 蒋廷瑜:《南越王国人殉试探》,《广西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 覃彩銮、覃圣敏、蓝日勇等:《从考古资料看汉初南越国的农业》,《农业考古》1985 年第 1 期; 余天炽:《南越国时期岭南经济文化的开发》,《广州研究》1986 年第 2 期; 陈伟明:《汉初南越国农业生产述评》,《广西民族研究》1989 年第 3 期; 萧亢达:《从南越国“景巷令印”、“南越中大夫”印考释蠡测南越国的官僚政体》,《广东社会科学》1994 年第 5 期。

[121] 后德俊:《从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看楚国科学技术对南越国的影响》,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 232-237 页; 王子今:《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载《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集选集》,文物出版社,

2005, 第 131-140 页; 王芳:《从南越王墓看西汉南越国的医疗观念》,《文物春秋》2007 年第 2 期。

[122] 冯雷:《南越国与海外交流》,《岭南文史》2000 年第 3 期; 周永卫:《南越王墓银盒舶来路线考》,《考古与文物》2004 年第 1 期; 彭年:《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先驱——从南越国遗迹看南越文化及其历史地位》,载《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 211-220 页。

[123] 牛沛:《广州旧铸管厂地块南越国至南朝墓葬出土带釉器的科技分析》,《中国陶瓷》2018 年第 11 期; 牛沛:《广州旧铸管厂地块南越国至南朝墓葬出土陶瓷器的分析》,《硅酸盐学报》2019 年第 6 期; 冯兆娟:《南越王墓出土铁器保护浅谈》,《广州文博》1990 年第 4 期;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西汉南越王“丝缕玉衣”的清理与复原》,《文物》1991 年第 4 期; 莫鹏、许方强:《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与修复》,载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合编《文物修复与研究》,国际文化出版社,1995。

[124] 易西兵:《城市核心区的考古遗产——广州南越国遗迹的保护与展示实践》,《城市观察》2014 年第 4 期; 高大伟、岳升阳:《南越国宫苑遗址的文化价值研究》,载《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 174-192 页; 章昀:《南越国宫署遗址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价值的分析》,《福建文博》2012 年第 4 期; 程浩:《从南越国宫署遗址看海上丝路发展》,《中外文化交流》2012 年第 4 期; 高占盈、卓识:《早期岭南建筑历史资源研究——以南越国时期为中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125] 田静:《关于南越国史迹申遗的分析》,载《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 254-261 页; 雷依群:《南越国遗迹与申遗研究》,载《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 261-264 页; 肖华:《南越国遗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研究》,载《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第 265-270 页。

[126] 张晓斌、郑君雷:《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类型及其文化遗产价值》,《文化遗产研究》2019 年第 3 期。

[12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第 456 页。

[12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 年第 2 期。

[129] 广东省博物馆发掘小组、肇庆市文化局发掘小组:《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11 期。

[130] 徐恒彬、杨少祥、禡富崇:《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 年第 9 期。

[131] 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 年第 4 期。

[132]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载《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 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 111-119 页。

[133]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7 期;《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第二次发掘》,《文物》2000 年第 6 期。

[13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县博物馆:《广东和平县古文化遗存的发掘与调查》,《文物》2000 年第 6 期。

[135] 李龙章:《南越王墓出土陶器与两广战国秦汉遗存年代序列》,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编《华南考古 1》,文物出版社,2004,第 100-112 页。

[136]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 261 页。

[137] 李龙章:《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考古》2006 年第 4 期。

[138] 蒋廷瑜:《右江流域青铜文化族属试探》,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 501-518 页。

[139]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广东增城、始兴的战国遗址》,《考古》1964 年第 3 期。

[140] 廖晋雄:《广东始兴县白石坪山战国晚期遗址》,《考古》1996 年第 9 期。

[141]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广东增城、始兴的战国遗址》,《考古》1964 年第 3 期。

- [142] 杨豪、杨耀林：《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12期。
- [143] 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 [144] 余静：《再论关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 [145]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宁县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98年第7期。
- [146]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第390-391页。
- [147]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下）》，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二年》，文物出版社，2012。
- [148] 余静：《再论关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 [149] 李龙章：《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考古》2006年第4期。
- [150] 余静：《再论关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 [151] 邱立诚：《论广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文化》，载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
- [15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 [153]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1981，第472页。
- [154]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 [155]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〇年》，文物出版社，2010，第47-58页。
- [156] 郑君雷：《平乐银山岭墓地的年代学问题》，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新果集（二）——庆祝林法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第353-369页。
- [157] 何纪生：《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第4期。
- [158]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载《考古》编辑部编辑《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11-119页。
- [159]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 [160] 广东省博物馆发掘小组、肇庆市文化局发掘小组：《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
- [161]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 [162] 全洪：《南越国铜镜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 [163] 余静：《再论关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 [164] 杨式挺、崔勇、邓增魁：《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 [165]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乐昌市博物馆、韶关市博物馆：《广东乐昌市对面山东周秦汉墓》，《考古》2000年第6期。
- [166]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灌阳县文物管理所：《灌阳县古城岗战国墓》，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94-100页。
- [167]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〇年》，文物出版社，2010，第47-58页。
- [16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市文物工作队、灵川县文物管理所：《灵川马山古墓群清理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第228-237页。
- [16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岑溪县文物管理所：《岑溪花果山战国墓清理简报》，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213-227页。
- [170]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上）》，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〇年》，文物出版社，2010，第47-58页。
- [171] 熊昭明：《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5-41页。

- [17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173]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 [174] 李龙章：《广西右江流域战国秦汉墓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 [175] 蒋廷瑜：《右江流域青铜文化族属试探》，载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第501-518页。
- [176] 余静：《中国南方地区两汉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102页。
- [17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第89、112页。
- [178] 全洪：《重识龟岗汉冢——广州东山龟岗南越木椁墓年代及墓主问题》，载澳门博物馆编《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论文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5，第84-95页。
- [179] 熊昭明：《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5-41页。
- [18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贺县文物管理所：《广西贺县金钟一号汉墓》，《考古》1986年第3期。
- [181] 全洪：《南越国铜镜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 [18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风流岭三十一号西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 [183] 熊昭明：《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5-41页。
- [184]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马坝的一座西汉墓》，《考古》1964年第6期。
- [18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罗岗秦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 [186] 卓猛：《南越国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分区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